

太平洋戦争史

第五卷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太平洋战争史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編 者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譯 者

金 鋒 冷 明

孔知行 王炳达 馬君雷

內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太平洋戦争史》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1954年7月15日
东洋經濟新报社出版

内部讀物

太平洋戦争史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金鋒等譯

商务印书館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京華印书局印装

統一書号: 11017·146

1963年3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1千字
印张 8—10/16	印数 1—3,500册
定价(9) 1.20元	

目 录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間力量对比的变化 3

第一节 两个世界 3

新政权的誕生——人民民主主义革命(3) 大国合作和联合国(6)
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9) 美国的世界政策(12) 战后的法国、英
国、意大利(15) 两个世界的形成——苏美的对立(17) 战后美国
的亚洲政策(18)

第二节 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革命 23

殖民统治的危机(23) 印度支那的民族革命(24) 印度尼西亚的动
态(30) 馬來亚民族解放軍(36) 緬甸的“独立”(39) 菲律宾的民
抗軍(42)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45)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进展 48

民族解放力量和国民党政府的对立(48)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51)
馬歇尔的調处和內战的爆发(55)

第二章 占領和“民主化” 63

第一节 从东久邇內閣到第一次吉田內閣 63

美国在占領初期的对日方針(63) 东久邇內閣和軍队的瓦解(65)
工农运动的再起(68) 币原內閣(70) 各政党的成立(72) 币原內
閣的垮台和政治上的空白期(73) 第一次吉田內閣(76)

第二节 統治体制的对美从屬化 78

占領体制(78) “民主化”的实质(81) 修改宪法(82) 远东国际軍
事法庭审判战犯和整肅(85) 壟断資本的改組(87) 土地制度的“改
革”(91) “教育改革”(96) 民主力量的壮大(98) 从十月斗爭到
二·一总罢工(103) 占領下的文化(108)

第三章 国际局势的紧张化 114

第一节 冷战的开始 114

杜魯門主义(114) 馬歇尔計劃和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116) “西
欧”陣营的危机(118) 南斯拉夫問題(121) 北大西洋公約(123) “和

“平政势”(126)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	133
解放军胜利的根本原因(128) 反动派的挣扎(131) 解放军的决定性胜利(132) 中国革命的意义(134) 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135)	
第四章 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133
第一节 “中间政权”的任务	133
片山内阁的成立(133) 片山内阁的垮台和芦田内阁(140) “远东的兵工厂”化(142) 第二百零一号政令(145) 加强警察(148) 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事件(150)	
第二节 准备战争体制	151
第二次吉田内阁和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151) 第三次吉田内阁(153) 加紧镇压(156) 道奇路线(158) 危机的进一步发展(163) 反对解雇的斗争(164) 下山事件、三魔事件、松川事件(168) 农村中反动势力的进攻(169) 殖民地文化的泛滥(172)	
第五章 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	176
第一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	176
独立运动的高涨和南北分裂(176) 走向统一的趋势(179) 开战前夕的国际形势(181) 准备战争(183) 战争的爆发(185) 战局的转变(187) 停战谈判的开始(188) 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190)	
第二节 日本的重新武装	192
警察预备队的建立(192) “日美经济合作”(195) 开倒车(198) 整肃共产党(202) 通货膨胀和加强劳动强度(205) 文化的反动化(207)	
第三节 对日和约的签订	209
准备单独媾和(209) 为全面媾和而斗争(213) 旧金山会议(220) “和约”的内容(224) 展望——为了结束战争(226)	
編后記	229
附录(一) 年表	230
附录(二) 資料	254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間 力量对比的变化

第一节 两个世界

新政权的誕生——人民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是空前的。根据梵蒂岡教廷所发表的数字,在这次大战中,共有二千二百余万人丧失了生命,受伤的有三千四百余万人。在这次战争中,特别是非軍事方面的被害者,也就是一般平民的死伤及其他損失的数字非常庞大,这是这次战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例如,在整个战争中从未直接成为战場的英国本土,尚且由于空袭伤亡了十五万左右的平民,烧毁了二百万户以上的房屋。(《朝日年鉴》1947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在被害的惨重方面,就是在战争性质方面,也和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属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迥乎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有着西方国家的統治阶级对德、意、日三国統治阶级所进行的反軸心战争的性质,这是事实;而在大战过程中,由于英美等国的阴谋策动,反軸心国家的联合战线也曾不止一次地面临分裂的危险。尽管这样,整个说来,这次战争确实具有强烈的反对法西斯压迫的解放战争的性质;具体地说,假如沒有以苏联人民为首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反法西斯解放斗争,1945年同盟国的胜利是不能想象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也是从这次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在战后应该受到注意的,不仅有美国在資本主

义世界中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还有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

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了以下的概括：“结果并不是苏联被消灭或削弱，而是苏联更加强大了，它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了。结果并不是民主制度被削弱或毁灭，而是中欧和东南欧几个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并确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结果并不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遭受进一步的奴役，而是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新的、强大的高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危机尖锐化了。”①

首先看看欧洲的形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由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国，都以战争中的抵抗运动为中心相继产生了新的政权。南斯拉夫在1945年11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取得百分之九十的选票而大获全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6年5月的制宪会议的选举中取得了二百六十九万张选票而跃居第一大党。波兰也在1946年6月举行的人民投票中，民主阵线首先取得胜利；接着，又在1947年1月的大选中，以社共两党为中心的民主力量获得了百分之八十六的选票，而美英两国所支持的伦敦流亡政权米柯拉契克的农民党，仅仅获得百分之七的选票而遭到惨败。阿尔巴尼亚在1945年12月的选举中，民主阵线获得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而大胜。保加利亚在1946年10月的选举中，祖国阵线获得了百分之七十的议席。罗马尼亚在1946年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派也获得百分之七十二的选票而胜利。情况稍有不同的是匈牙利，在这里，经过1945年5月的第一次选举，共产党成为第一大党，但在同一年11月的第二次选举中，小农党取得胜利，因而产生了社共两党联合政权。

①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编者

对于东欧局势的这种变化,丘吉尔早在 1946 年 3 月在美国富尔顿市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就曾叫嚷说:“今天,在北起波罗的海的斯特丁,南达亚德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的这条线上,已经设下了一道铁幕”,并攻击“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左翼力量的增长,并不限于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内。首先,英国工党在 1946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三百九十三个议席(保守党在全部六百四十个议席中仅占一百九十八席)。其次,在同年 10 月举行的法国制宪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一百五十一个席位而跃居第一大党,人民共和党取得一百五十席而成为第二大党,社会党取得一百三十九席而成为第三大党;在意大利,通过 1946 年 6 月的选举,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二百零七席,社会党取得一百一十五席,共产党取得了一百零四席,在这两个国家里成立了有社共两党参加在内的联合政府。唯一例外是英军占领下的希腊,英国在这里排除了战争期间的抵抗力量——人民阵线而支持了流亡政权。在 1946 年 3 月由英国外相贝文所一手策划的大选中,人民阵线进行了抵制,结果由人民党一党攫取了胜利,但选民的弃权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七。由此而成立的查理达利斯内阁,上台后立即开始镇压人民阵线派,而经过 9 月的国民投票,竟使格奥尔格奥斯二世的复辟得到成功。对此,丘吉尔曾赞扬说:“独有雅典保持了不朽的光荣和决定其未来的自由”。

然而,社会主义力量在战后的欧洲有了这样显著的发展,是否可以单纯地断定为“苏联的扩张政策”的结果呢? 斯大林在 1946 年五一劳动节发布的命令中说道:“人民群众由于战争教训的体验,懂得了国家的命运不能付托给那些追求狭隘阶层与自私的反人民目的的反动统治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那些不再愿意按照旧的方式生活的各个民族,便把他们的国家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建立民主秩序,积极地进行反对反动力量,反对新战争挑拨

者的斗争”。^①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欧洲，在亚洲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使西方国家“无可奈何”的情况（拉铁摩尔：《亚洲的形势》）。在近东方面，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外约旦，也门等七个国家也通过 1945 年 2 月的开罗会议，结成了阿拉伯联盟，声明互相援助，共同防御，作为中立的第三种势力而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束缚。

这样，在战后世界的力量对比上，左翼力量有了很大增长，出现了所谓“两个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形成了以摆脱了二十年来“外交上孤立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包括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在内的反资本主义阵营，从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全面危机的第二阶段。

大国合作和联合国

在历史上从未见过，象 1945 年夏季终结的战争那样在有利于建立决定性和平的良好条件下结束的战争。（塞勒：《战争还是和平？》）这种良好条件的基础是以后来美国国务卿贝鲁纳斯称之为“苏美英友谊的高潮”的雅尔塔会议为顶点的三国合作；是在和平时期也和战争时期一样进行合作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战争末期产生了建立和维护和平的国际制度，它的核心组织则是构成三大国协商形式的“外长会议”和“联合国”的二重机构。外长会议，根据 1945 年 12 月的莫斯科协定把法国也包括进来而发展为四国外长会议。经过 1945 年 6 月的旧金山会议而宣告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在同年 12 月在伦敦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决定将其总部设在纽约，并于 1946 年 1 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此外，还有一件事应该和这一维持和平机构的成立相提并论，那就是世界工

① 《论战后国际形势》，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7 页。——译者

联的成立。世界工联是经过 1945 年 2 月在伦敦和同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包括苏英美法等五十六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共同参加下宣告成立的。

貫串着作为战后“维护和平机构”的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是“大国一致的原则”，因此，在联合国机构中，五大国（苏、中、美、英、法）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占居优越地位一事，已经受到公认。这个否决权，诚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 1946 年 12 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用“否决权的叛乱”一语所讽刺的那样，不久就受到了各小国的集中反对。莫洛托夫对此曾加以反驳，他说：对否决权的否定，将使大国降到和小国同等的地位，而以“单纯的多数表决原则”束缚大国的行动，这是和“大国一致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这是因为，苏联主张大国一致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不仅是为维护旨在保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国际机构所必需的，而且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也得到了美英两国的赞同。（参看本书第 4 卷，第 1 章，第 2 节）因此，战后“和平的危机”，就是由于这种大国一致的原则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尤其是这一原则的核心——“苏美合作”，更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然而，对于“苏美合作”的问题，在从其成立的一开始，美国国内就存在着反对因素。从罗斯福执政的末期起，在掌握对外条约批准权的美国参议院中，共和党领袖范登堡、塔夫脱等人的发言权逐渐加强，对苏协调政策根据杜勒斯的所谓“两党外交”，开始受到修正。这种趋向随着杜鲁门的上台而更加显著，但到 1946 年秋季为止，仍旧保持着对苏协调的基本路线。因此，在整个战后期间外长会议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也只有在这一段时期里，即：1945 年 9 月在伦敦，同年 12 月在莫斯科和 1946 年 4 月在巴黎所召开的各次外长会议，先后讨论了对意大利等五个国家的媾和条约草案，设置了远东委员会、盟国对日委员会和有关朝鲜问题的苏美共同

委員會，以及作出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對五國的和約草案，又經過 1946 年 8 月在巴黎召開的媾和會議中二十一個有關國家的審議以後，於同年 10 月在紐約外長會議上宣告成立，並於 1947 年 2 月在巴黎正式簽字。這是“終於通過了走向和平的漫長旅途中的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和平後所邁出的第一個重要步驟。”（貝爾納斯：《講老實話》）

然而，對立也已經開始了。在 1946 年 2 月的安理會會議上，因討論伊朗政府就伊朗人民黨在阿塞拜疆進行革命活動問題提出的控告，蘇美兩國之間第一次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接着，又發展到希臘共產黨的游擊戰問題。同年 6 月在巴黎舉行的外長會議上，蘇美兩國又因為對德奧兩國的和約問題發生了全面的對立。而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會議上，主張“原子能國際共管”的巴魯克計劃和主張“立即禁止原子武器”的馬立克建議，也形成了對立。關於美國的所謂“原子彈外交”，曾任國務卿的當時陸軍部長史汀生，經過反復考慮的結果，得出了否定的見解，他在 9 月 11 日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一份備忘錄，預言說：“蘇聯掌握生產這種武器的秘密，快則四年，最遲也不超過二十年”，並且警告說：“由於我們在解決原子武器問題上對蘇聯的態度，很可能使美蘇關係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因為，如果我們不肯立即向蘇聯表示誠意，而只是把這種武器拿在手里，一面炫耀，一面交涉，則將加深蘇聯對我們的動機和目的的疑慮和不信任”，因此，他建議美蘇兩國必須立即開始具有誠意的直接談判。（馬爾札尼：《美蘇可以進行協商》）

但是，杜魯門並未採納他的建議，在原子武器問題上，從一開始就對蘇聯採取了高壓的態度。巴魯克計劃，關於原子武器問題，事實上近乎要求蘇聯無條件投降，炫耀壟斷原子武器的美國，想利用這個計劃來試探蘇聯的反應。他們所以這樣作，也是企圖把問題移交給沒有否決權的國際管理機關，以便為美國造成壟斷原子

彈的有利條件。蘇聯對此，並未示弱，相反地，它譴責美國是在進行原子詭詐，並在12月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先發制人地提出了裁減軍備的方案。

然而，在這時期蘇美兩國的對立尚未進入決定性的階段。這可以从以下這段插曲得到證明。美國總統杜魯門曾在这次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說道：“我們知道，最近一再有人談論發生新戰爭的可能性問題。……但是這種恐懼，完全是沒有根據的”。當杜魯門將要退出會場時，莫洛托夫上前擁抱他，並贊揚他的演說是“近來最偉大的一次演說”。

蘇聯國際地位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蘇聯來說，也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遭受的一個嚴重考驗。1945年11月，莫洛托夫在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的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說：“法西斯德寇佔領了我們一千七百一十個城鎮，燒毀破壞了七千多個大小村莊，殺傷了大約二千五百餘萬人……”，僅就士兵來說，蘇聯就傷亡了七百餘萬人，比起美國的一百一十三萬人、英國的九十八萬人、法國的七十八萬人來，犧牲之重大可以想見。美國國際政治學家舒曼在他所著的《國際政治學》一書中曾經寫道：“蘇聯的損失，相當於西歐盟國全部損失的十倍。”經受了這種史無前例的嚴重打擊堅持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的蘇聯人民的毅力，受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贊揚，並大大提高了蘇聯在戰後的國際地位，這是理所當然的。斯大林在1946年2月最高蘇維埃選舉時向選民發表的演說中曾提到：“現在所講的已經不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有了這次戰爭的具體教訓以後，任何一個懷疑家，都已不敢再對蘇維埃社會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什麼懷疑了。”（《論戰後國際形勢》，第16頁）

苏联在战争中根据周密的、科学的计划，执行了“边战争，边建设”的政策，不但继续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和斯达哈诺夫运动，还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即使在 1943 年战争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苏联工业的生产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到战前 1939 年的百分之一百零四。苏德战争的中期以后，苏联在军事生产方面也超过了德国，并不断上升，在整个战争时期，例如，飞机的产量是十二万架（德国是八万架），大炮的产量是三十六万门（德国是二十六万门）。1943 年 8 月以后，就在曾被德寇占领而获得解放的地区，根据“复兴经济的紧急措施”开始了经济建设。到了 1944 年，又以铁路、钢铁、煤炭、电力为重点，迅速地进行了重工业部门的重建工作。但是，由于从战争经济转向和平经济，致使 1946 年的生产总值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战后的五年计划，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出发的。

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而实行重建，苏联最初曾经期待从美国得到十亿美元贷款和向原来的敌国索取赔款；但由于苏美关系的恶化，这种期待落空，终于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行经济复兴工作。

1946 年 2 月（即从战前的 1937 年算起第九个年头），苏联举行了最高苏维埃选举。这次选举，正如斯大林在选举演说中所说的战胜者也必须受到批评受到裁判那样，采取了由苏联共产党提出五年计划，征询人民对苏共政策是否信任的方式。结果，不出所料，党与非党联盟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一亿六千三百万票），取得了压倒的胜利。

苏联就这样开始了战后的新五年计划。工业的生产总值，到第二年的 1947 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1939 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三，以后逐年都有增加，1948 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1949 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八，1950 年为百分之一百九十六，1951 年为百分之

二百二十九。和苏联从战争破坏中着手恢复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处境尽管远为有利，但其生产的发展速度，从1950年以后反而落在苏联的后面了。（美国工业的生产指数，如以战前的1939年为一百，1946年为一百五十六，1947年为一百七十一，1948年为一百八十九，1949年为一百六十二，1950年为一百八十四，1951年为二百一十二。）

在国内政治方面，苏联在停战后迅速地开始了军队的复员工作，到1948年，已经把常备军裁减到三百万人。1946年3月，又改革了行政机构，废除了以往的人民委员会制，而代之以部长会议制，于1947年5月，又废除了叛国罪以外的一切死刑，而改为最高刑期为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1947年12月实施的币制改革和撤销粮食定量供应制，也标志着苏联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先和东欧各国，以后又和新中国缔结了通商和友好条约，加强了“东欧圈”的团结。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以斯大林的“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理论”为前提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和平共处理论”。这是建立在斯大林在1946年2月的演说中所说“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信心之上的和平政策，具体的说，这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实行“国际合作”和“反对侵略战争”的政策。

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在富尔顿所发表的演说时曾经指出，过去的东欧经常存在着仇视苏联的政权和东欧经常被利用作为侵略苏联的走廊等事实，并且说：“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要达到使这些国家内存在着对于苏联保持诚恳关系的政府，这有什么奇怪吗？”（《论战后国际形势》）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当前任务而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的苏联最迫切地需要和平，这一点，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的世界政策

“这次战争，归根结底是争夺统治世界霸权的斗争。它也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战争的结果，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征服世界，或者是被人所征服。”这段话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工厂通用电气公司顾问鲍尼在1942年说的。这也可以说是表达了美国垄断资本对于这次战争的看法。

在大战期间，以“民主国家兵工厂”自任的美国，到1943年已经把生产力提高到战前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与此同时资本也有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垄断化。例如，资本总额在十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在1914年只有七家，到了1943年增加到三十二家，到1951年又增加到五十八家；而在1950年，二百五十家大公司资本总额已占全部美国股票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二，掌握着全部工业生产力的百分之七十。（《今天的垄断资本》）掌握着这些大公司的是摩根（五百五十三亿美元）、洛克菲勒（六百六十七亿美元）、杜邦（六十五亿美元）、梅隆（六十亿美元）、库恩-罗比（一百三十亿美元）、芝加哥（九十三亿美元）、克利夫兰（三十六亿美元）、波士顿（六十亿美元）等大财团。摩根集团和馬歇尔、艾奇逊、克萊等，洛克菲勒集团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罗伊、杜勒斯等政客、军人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不可否认，垄断资本家和军人們，在战前和战后期间越来越多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军事订货共达二千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落到了这些大财团的手里。同时，他们的企业利润在整个战争期中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在1939年，除掉繳納稅款后的純益是四十亿美元左右，1943年增为九十八亿美元，1946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九亿美元；到1948年竟达到二百零八亿美元之多。尤其是杜邦集团的通用汽车公司、摩根集团的美国钢铁公司、梅隆集团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以及洛克菲勒

集团的美孚油公司等等，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由于垄断资本有了这样的扩张，使共和党 and 民主党在南部的保守派的压力有所增大，这可以说是洛克菲勒财团董事、共和党参议院議員杜勒斯在战后很快地就作为两党外交的主持者登上了美国外交舞台的原因之一。杜勒斯的两党外交，无非是上述寶尼所說的“盎格魯·撒克逊统治世界”在战后的翻版，其目的在确立美国对战后世界的“领导权”，即认为：“我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負有作为领导者的責任”。（杜勒斯：《战争还是和平？》）由范登堡、康納利、杜勒斯等所代表的共和党“两党外交”攻击民主党政府的矛头，指向了由罗斯福所制定而被杜魯門所继承下来的对苏协调政策。他們开始滥用过去斯大林批評西欧国家对納粹德国的外交时所用的“綏靖政策”一語，来攻击雅尔塔、波茨坦方式，称之为“对苏綏靖政策”。在民主党内部，受到南方保守势力支持的杜魯門，也陸續地把政府内部拥护新政的人們驅逐出去，1947年使杜勒斯（国务院顧問）、狄龙—李德公司總經理弗莱斯特（国防部长）、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總經理哈里曼（商务部长）、圣路易的銀行家斯奈德（财政部长）等实业家以及馬歇尔（国务卿）、德萊柏（陆軍部长）、佩德·史密斯（駐苏大使）等軍人担任政府要职，完成了“美国政府的軍事化”。（舒曼：《国际政治》）

但是，美国在杜魯門执政的初期，因为經濟力量占着压倒的优势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在遭到战争破坏的世界里可以毫不費力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对于保持欧亚两洲的商品市場問題，頗抱乐观。对于战后的美国來說保持国外商品市場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以下这段話中看得出来，这就是：“不扩大国外市場而要維持现在的生产水平，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扩大全世界的貿易，美国的經濟将不得不收縮”。另外，1945年11月，杜魯門也曾向美国退伍軍人說道：“‘己所欲，施于人’这句

格言不但适用于你们，而且也适合于英国、法国、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是这种意思。美国对于没有支付能力的欧洲国家的商品输出，采取了以经济援助为名的借款和投资的方式。截至1949年为止，美国的对外投资共达三百三十亿美元，其中一百四十六亿美元是通过美国政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贷款的方式。最初，美国实行这种贷款并未区分东西方，但是这种以经济援助为名企图确立其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的所谓“附有条件的援助”，受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谴责；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出乎美国意料之外，国外市场日益缩小，到1946年中期，美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尤其是苏联经济复兴的进度意外地迅速和东欧以及法意等国左翼力量的增长，粉碎了美国的乐观论调，这就使得美国不得不从新改变外交政策，以便回避经济危机和恢复其逐渐丧失的国外市场。于是，凯南的“对苏封锁政策”便取代了“对苏协调政策”。

凯南在美国国务院中以苏联问题专家自命，从战前就被认为“用柏林的眼光观察俄国”的亲德反苏论者。据说在战争期间，他经常对于“美国同苏联合作对付德国感到不满”；而对于当时美国驻苏大使、能够比较直率地反映苏联情况的戴维里斯抱有反感。（阿纳贝拉·比尤卡尔：《美国外交的真相》）1944年凯南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顾问，他利用罗斯福死去的机会开始破坏“对苏协调外交”，接二连三地向华盛顿提出了《苏联统治世界》、《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苏联）对美国的侵略野心》等项报告，强调指出：“和俄国的一切协定都将不被履行”，因而，“和苏联政府缔结协定是徒劳的”，“美国在一切问题上，都应该对苏联采取反对的立场”，尤其是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协定更是“严重的失策”，“美国应该不受这些协定的约束而采取自由行动”。（凯南：《美国外交五十年》）凯南从莫斯科寄回的报告，受到了国务卿贝尔纳斯的重视，以后在1947年，他被马歇尔提升为国务院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是；他